

《申鉴》的流传和版本问题

张 涛

《申鉴》五篇（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杂言下》），东汉末年荀悦撰。此书是一部重要的政论著作，而且“其所论辩，通见政体”（《后汉书·荀悦传》），所以广泛流传，颇为后世所重。

一

东晋时，袁宏著《后汉纪》，对荀悦奏呈《申鉴》（建安十年）一事做了记载，并节引了该书《政体》有关“四患”、“五政”和《时事》有关“备史官”的内容，文字多有与今所见各本不同之处。如“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怠，怠则怨”一句，就与今本“小人之情，骄则恣，恣则怠，怠则怨”迥异。再如“使自安之”的“安”，今本作“交”；“虽天下不得保其性”的“下”，今本作“地”，等等。

袁宏《后汉纪》问世约五十年后，南朝刘宋时，范晔成《后汉书》，其中《荀悦传》亦节引《申鉴》，内容与袁书大致相同，只是在“备史官”前多引了“尚主之制”一段。所引与今本相异者也不少。如今本“财不虚用”的“虚”，此作“贾”；“而成王治”的“治”，此作“化”；还有前引“小人之情”一句，此作“恣则怨，怨则叛”，等等。前人校读《申鉴》时，都十分注重《后汉书·荀悦传》的材料，但对早出的袁宏《后汉纪》几乎从未涉及，令人遗憾。

隋代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三处引用《申鉴》，文字与今本略异。如今本《俗嫌》：“或曰：‘祈请者，诚以接神，自然应也。故精以底之，牺牲玉帛以昭祈请，吉朔以通之。’”《书钞》卷九十引作：“或问祈请。曰：‘诚以接神，自然应也。故精神以底之，牺牲玉帛以昭之，告诉以通之也。’”所引实较今本为明晰。

唐太宗初年，魏征等編集《群书治要》，征引《申鉴》中《政体》、《时事》、《杂言上》和《杂言下》的各一部分内容。于此我们可以发现今本夺落甚多。如《政体》中，“民作基”下脱“制度以纲之，事业以纪之”两句，“外无异望虑其”下脱“有罪恶者无”五字，“则贤臣不用”下脱“贤臣不用”四字，“上不访”下脱“下”字，“不谏”下脱“上”字。《杂言》中，“君子三谏”下脱“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三句。“臣戒专利”下脱“或问天子守在四夷有诸”至“一言之寇袭于膝下”，凡一百七十一字。另外，其他与今本相异之处，也多有较今本为胜者。清代钱培名在《申鉴札记》中说：“若无《治要》一书，则《申鉴》不可读矣。”此诚为笃论。

在《群书治要》成书后不久，唐高宗年间，《隋书·经籍志》修成，其子部儒家类著录：“《申鉴》五卷，荀悦撰。”这是《申鉴》最早见于现存目录著作中。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均予著录，且未见有篇卷变化。

唐德宗时，马总编成《意林》，摘录《申鉴》要语八条，文字也有与今本相异之处。如今本“百僚和而不同”的“僚”，此作“官”；“私政行”的“私”，此作“内”，等等。

至宋初，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亦引《申鉴》之文，且有与今本不同者。如卷四百一所引“圣不至圣，何以尽性”，今本无。今本《俗嫌》有“学必至圣，可以尽性”一句，《御览》所引当在此句下，其首一“圣”字，疑为“学”字之讹。再如今本

“夏商之衰”，《御览》卷七一七引作“商德之衰”。

宋神宗时，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荀悦奏呈《申鉴》一事，节引了书中“四患”、“五政”的内容，文字也有与今本相异之处。

以上是北宋及其之前的书籍引用《申鉴》的情况。当时流传的《申鉴》的抄本或刻本，文字与后世的本子多有不同，而这些抄本或刻本面貌是大致相同的。如今本“不可观以善”的“观”，《后汉记》、《后汉书》、《治要》、《通鉴》均作“劝”。“慎其刑也”，《后汉纪》、《后汉书》、《治要》、《通鉴》均作“矜其人也”。“则国治矣”，《后汉纪》、《后汉书》、《通鉴》均作“则国法立矣”。“垂拱揖逊”的“逊”，《后汉纪》、《后汉书》、《治要》、《通鉴》均作“让”。“等各有异”，《后汉纪》、《后汉书》、《书钞》、《治要》均作“苟有茂异”。应该看到，有些异文是由形近、音同或义同所致，如“观”与“劝”，“逊”与“让”。还有今本“善恶要于功罪”的“于”，“恶无不彰”的“彰”，《后汉书》分别作“乎”、“章”；“政末由行”的“末”，“以奸讎伤忠正”的“讎”，《治要》分别作“无”、“干”，等等。另外，古人引书，未必一字不差，完全符合原文，或有节略其辞，仅用书意者，对《申鉴》亦不例外。如原书首句“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意林》节引作“道本仁义”。再者，《通鉴》及其以前诸书所引，个别文字也有小异，一书与今本异而另一书与今本同的情况还有不少。校读《申鉴》时，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

二

目前所知《申鉴》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尤袤江西漕台刻本。此本刊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尤氏在其序里说：“荀悦书五卷，……世罕见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台。但简编脱

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损，疑则阙之，以俟知者。”惜此本今已不存，惟尤序收入明清时的一些刻本中。《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记有元陈子仁本，今亦未见。

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申鉴》刻本，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大梁李濂刻本。此本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前有尤袤序和李濂自序。李氏自序称：“《申鉴》久无刻版，余守沔阳，乃刻之郡斋。”此后，嘉靖十二年（1533年）张惟恕刻本以及《十二子》本、《子汇》本（后二本均题《小荀子》）等，也是据此本刊刻的。

李濂本刊成的第二年，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吴县黄氏文始堂刻本问世。此本半页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黄省曾注，注为双行小字，顺文解说，前有王鏊序和黄氏自序。黄省曾，字勉之，年轻时与其兄鲁曾散金购书，覃精艺苑，嘉靖时举人。他在自序中说：“（其注）浹旬而成，共得万四千余言，以笥藏之，虽不能无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证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词奥义，讹文脱简，则俟大方君子览而正焉。”嘉靖年间，文始堂再度印行，前增嘉靖四年（1525年）何孟春序，末附正德十六年（1521年）乔宇跋。王氏序称：“（《申鉴》）世亦罕传，吾苏黄勉之好蓄异书，又为之训释，搜讨磔裂，出入五经、三史、《春秋》内外传、《老》、《庄》、《淮南》、《素》、《难》、《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悦旨。”何序亦称：“是五篇者，宋尤袤刻置江西漕台时，已云其‘简编脱缪，字画差舛’。君兹所注，得微其本欤？有功仲豫多矣。”正因为如此，明万历年间程荣《汉魏丛书》本、何充中《广汉魏丛书》本、胡维新《两京遗编》本，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以及民国时期《龙溪精舍丛书》本等，依据的都是文始堂黄注本，只是王谟本及据其刊行的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上海五凤楼《子书四十八种》本、世界书局《诸子集

成》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等，对黄注多有删略，前面只收了王鏊序。另外，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还有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诸子百家丛书》本，也都是用文始堂黄注本影印的。

文始堂黄注本原文脱缪之处较多，有些几不可读。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说：“是书刊于正德中，当时宋本必多，省曾意在作注以抒寄托，不暇访求善本，故讹夺如此耳。”此论可备一说。乔宇跋提到《申鉴》“深切时弊，关治化人君所当遵行者，悦之用心可谓勤矣。勉之感其所遭，而先帝之时适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窃弄威柄，遂愤激为注此书。”乔跋作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当时明世宗已立，所谓“先帝”，当指明武宗；所谓“奸臣心迹如操者”，当指权宦刘瑾之流。正德时，宦官刘瑾及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八人得宠于武宗，专擅朝政，肆意妄为。特别是掌司礼监的刘瑾，势焰薰天，朝中公卿多出其门。作为忠正鲠直的读书人，黄省曾对此愤懑不已，于是愈加推重苟悦的道德文章，进而借注《申鉴》以抒其志。他在自序中说，苟悦“立汉庭十二年，清虚沉静，未尝效一言于操，不其贤欤！不其贤欤！予尝悲其所遭而读其书，间窥其领要，遂为之注”。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黄氏无暇访求善本或对善本不予重视。南宋尤袤刻书时，世上已罕见《申鉴》全本，连尤袤所用版本都有“简编脱缪，字画差舛”的现象。至明代李濂刻书时，《申鉴》仍是“久无刻版”。可见当时并没有什么善本，即使有也极不易得。再者，早一年问世的李濂刻本，其文字与黄注本无所差异，更未见胜于黄注本之处，如《时事》“故二仪立而大业成”之后，此本亦有“君子之道，匪阙终日，造次必于是”一段错简。这说明二者据以刊刻的本子是相同的。

关于黄注本身的优劣得失，前人说法不一。王鏊序认为其“博洽精密”，乔宇跋也称其“尤为博洽”，而钱培名《札记》却言

其“无甚发明”，并于刊刻时“概从删汰”。还是《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较为客观、全面。它说：黄注“引据博洽，多得悦旨。其于《后汉书》所引间有同异者，亦并列其文于句下，以便考订。然如《政体篇》‘真实而已’句，今本《后汉书》‘实’作‘定’；‘不肃而治’句，今本《后汉书》‘治’作‘成’，而省曾均未之及，则亦不免于偶疏也”。

的确，黄注的可取之处是很多的。首先，引据博洽，注意运用各种文献资料参稽互证。如释《政体》“虎臣乱政”时引《尚书》，释“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时引《老子》，释“通于道者其守约”时引《孟子》等，原文与《后汉书》的异同也大都标出。其次，释词精当，便于人们把握文意。如《政体》“王允迪厥德”注：“迪，蹈也。”“臣作辅，民作基”注：“辅，助也，弼也；基，址也。谓臣工协策，民心巩固也。”《时事》“禄依食，食依民，参相澹”注：“澹，古‘贍’字，给也，即《汉书》‘犹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给食，食以给禄，所谓‘参相贍’也。”《杂言下》“贞以为质”注：“质，实也，主也。”第三，重视对历史背景和典章制度的说解。如《时事》“五铢之制宜矣”的注文，从“太公为周立九府圉法”，谈到“汉孝武帝元狩五年初铸五铢钱”，又谈到“世祖受命复五铢钱”，叙述颇详。接下来，“今废之如何”注云：“今谓献帝时。废者，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是也。”“海内既平，行之而已”注云：“言董卓已诛，此制宜复。”这些都为正确理解原文提供了帮助。最后，对原书的讹文脱简，慎于阙疑，不妄下断语或轻易改字，这在明朝中后期的学术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同时某些注文的推断，又是极有见地的。象《政体》“大有讲业”注：“‘有’当作‘则’。”“隐于手、应于钩”注：“‘手’下当有‘而’字。”“三曰道顺”注：“此下疑脱‘衰世之臣所贵乎顺者三，一曰体顺，二曰辞顺，三曰事顺’二十二字。”这最后一推测

正与《群书治要》相合，并为清代卢文弨《群书拾补》所用。又如《杂言下》“莫不为道”注：“‘道’当作‘大’。”“恶以成祸”注：“‘恶’当作‘怨’。”“上智怀惠”注：“‘惠’当作‘恶’。”“故人有情”注：“‘人’当作‘神’。”“情恶非情之罪也”注：“（首一）‘情’当作‘神’。”这几条注文，后来成为钱培名《小万卷楼丛书》本校改的依据，尽管钱氏认为黄注“无甚发明”。

当然，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黄注“亦不免于偶疏也”。一则今本原文与《后汉书》所引的相异之处并未全部标出，而且对《后汉纪》、《意林》、《治要》、《书钞》、《御览》、《通鉴》所引没有涉及。二则个别解释不当甚至有误，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杂言上》“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于郑”一句的注。这里的“郑”，黄注指为傅太后同母弟郑恽之子郑业，谬甚。此处“郑”实指郑崇。郑崇，字子游，汉哀帝时为尚书仆射。哀帝欲封傅太后从弟傅商，郑崇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坏乱制度，逆天人心”，还提醒哀帝注意“犯阴之害”，最后愤而取走诏书。傅太后闻知，大为怨怒。事见《汉书·郑崇传》。另外，黄注对一些错乱、脱误之处，亦未能指出，或言之不当。但是，瑕不掩瑜，到目前为止，在《申鉴》的注本中，黄注仍是最全、最好和最具权威性的。

三

在明代，《申鉴》的刻本还有不少，主要是一些节本、选本。沈津《申鉴类纂》一卷，节录《申鉴》各篇文字，无注，前有尤袤序和李濂序，在《百家类纂》中。张邦翼《申鉴选》，节选《申鉴》文字四十三则，无注，在《汉魏丛书选》中。吴世济《删节申鉴》一卷，删节《申鉴》各篇原文三十六则，无注，前有小叙，在《汉魏丛书钞》中。李元珍《小荀子类编》，节录《申鉴》原文，分类编入各目下，并加圈点、旁注，在《诸子纲目类

编》中。归有光、文震孟《小荀子评点》，节录《申鉴》原文，无注，加圈点、眉评，征引洪宣之、刘剑华、王子充、商素菴、何孟时、宋方城、王凤洲等诸家杂说，前有荀悦传略，在《诸子汇函》中。陈仁锡《申鉴奇赏》一卷，节录《申鉴》原文，以文评为主，前有序及荀悦小传，在《诸子奇赏》中。陈继儒、王衡《申鉴类语》，节录《申鉴》原文，分类编入各目内，在《诸子类语》中。上述各本均据李濂本或黄注本刊刻，版本价值不高，但对阅读和欣赏《申鉴》还是大有裨益的。

至清代，《申鉴》的刻本更为繁多，不过大都据黄注本刊成，只有钱培名《小万卷楼丛书》本是经过校刊，改动较大者。它以黄注本原文为底本，依据《后汉书》、《治要》、《书钞》、《御览》等，订其讹脱，凡有更正，著之札记，附于书后，其不可读者，悉仍其旧。此本于咸丰四年（1860年）刊成后，世人皆称善。后来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之排印。在钱培名之前，卢文弨、焦循、陈鱣等人也曾在明本上批校，撰写题跋。此外还有一些校勘、疏解性的著述出现。卢文弨《群书拾补》的《申鉴》部分，据黄注本及《汉魏丛书》本、《广汉魏丛书》本参校，摘其讹脱，辨正数十字。象《时事》“或问复仇古义也”，卢氏以为“复仇”下当有“曰”字。《俗嫌》“曰时群忌”的“曰”，卢氏校改为“日”。《杂言上》“学而知之者寡矣”的“寡”，卢氏校改为“众”。这些都是非常精当的。但卢氏未见《治要》，个别地方不免以意武断。孙诒让《礼记》的《申鉴》部分，依据《小万卷楼丛书》本，校订原文两条，皆以己意出之。如解说《时事》“執（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时，孙氏说：“執，当作‘執’，即古‘勢（势）’字。此言经师聚讼，势无两是，当参定之耳。”此说发疑正读，确实精辟。另外，李宝沚《申鉴文粹》一卷，节录《申鉴》各篇原文，并加圈点、断句，间附按语，收入《诸子文粹》中。

民国以后，除了据明清刻本校刊、排印的各种《申鉴》版本，尚有张文治《申鉴治要》，在《诸子大纲》中，录有《政体》全文和《杂言下》的五则文字，有断句，无注。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其《申鉴》部分，据黄注本校刊，节录原文，篇目各附白话译文，前有荀悦及其《申鉴》简介。此书1982年再版。笔者曾撰《申鉴选译》，所选原文，以黄注本为底本，参照他本及诸书所引，还有卢文弨《群书拾补》、钱培名《札记》、孙诒让《札迻》等，作了必要的校订，各篇有题解，加简要注释，末附今译，与《中论选译》合刊，名《申鉴中论选译》，列入《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最近已由巴蜀书社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

宋史研究著作出版信息（二）

1992年4月21至24日，开封市首届文化节期间，中国宋史研究会得以在河南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的85名代表提交78篇论文，学会理事会进行严格评审，选出35篇上乘之作，并决定汇集出版《宋史研究论文集》。全集约43万字，内容涉及宋代的官僚制度、商品经济、军事制度、人口问题、学术思想、典籍研究、文物考古、人物以及辽、金两朝的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同时把一些研讨已久的学术问题引向深入，如关于宋代政治史分期、关于宋代商业经营方式的发展等等，皆为发前人所未发。该书近期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 苗书梅 •